



龍序

學苑出版社

文心雕龍的傳播和影響

宙相為

無窮而莫能限量後雖有作者弗可尚已
自孔子沒由漢以降老佛之說興學者日趨
於異端聖人之道一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
固自若也當二家
之際孰能排而
斥之苟知以道為

汪春泓◎著

以聖為幾而立

《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

汪春泓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汪春泓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2.6

(学苑文丛)

ISBN 7-80060-024-6

I. 文… II. 汪… III. ①文心雕龙②文学理论-中国-南朝
时期 IV. I206.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65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8281490/68133200

发行部电话/传真:010-68279295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15 印张 356 千字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定价:30.00 元

目 录

1 刘勰略传与《文心雕龙》的产生·····	(1)
第一 刘勰略传·····	(1)
第二 《文心雕龙》之产生的文学史背景·····	(20)
2 《文心雕龙》问世以来的版本流传情况·····	(63)
第一 敦煌遗书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及其校勘价值···	(63)
第二 元至正本《文心雕龙》·····	(71)
第三 明代《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勘概况·····	(73)
(1)杨慎批点《文心雕龙》·····	(74)
(2)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本·····	(75)
(3)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本·····	(91)
(4)明代《文心雕龙》校勘之功臣·····	(96)
第四 清代《文心雕龙》版本校勘情况·····	(98)
(1)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本·····	(101)
(2)纪昀评《文心雕龙》·····	(108)
(3)郝懿行评述《文心雕龙辑注》·····	(110)
3 折中意识与《文心雕龙》的文章学体系·····	(115)
4 《文心雕龙》对于历代文学发展进程之影响·····	(136)
第一 《文心雕龙》在南朝的地位和影响·····	(136)
(1)齐梁时期的文论主流·····	(136)
(2)刘勰与萧梁各派文论冲突的理论分析·····	(142)
第二 刘勰《文心雕龙》在唐初之北南文风融合中 所发挥的理论主导作用·····	(150)

(1)唐前关于南北文学融合趋势之先声	(152)
(2)唐初朝野对于《文心雕龙》之关注	(153)
(3)重视《文心雕龙》紧紧围绕融合南北文风之主题 ..	(158)
第三 《文心雕龙》对于盛、中唐文艺思想发展的影响 ..	(167)
(1)考察《文心雕龙》在《文镜秘府论》以及《诗式》等 文献中的影响	(167)
(2)白居易对于《文心雕龙》重视文学现实功用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	(176)
(3)关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出来的诗学思想与 《文心雕龙》之关系	(181)
第四 刘勰于唐代古文运动之文、道关系论之启迪	(183)
第五 刘勰对于北宋古文运动之文、道关系论的启迪 ..	(192)
(1)以道灭文派	(196)
(2)道、文折中派	(200)
(3)重文轻道派	(204)
第六 《文心雕龙》对宋代诗话之类文献的影响	(212)
第七 元人对于《文心雕龙》之接受与阐发	(217)
第八 明代性灵派等借助《文心雕龙》所展开的文学 思想	(229)
(1)杨慎凭借《文心雕龙》评点所表达的文学思想	(230)
(2)对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本所涉及文学思潮 之研究	(242)
(3)曹学佺的《文心雕龙》研究及其文学主张	(258)
(4)《文心雕龙》对于明代文体论影响之考察	(273)
(5)《文心雕龙》对于明代文学创作论影响之概述	(285)
(6)明代《文心雕龙》学所涉及相关问题之综述	(288)
第九 清代宗经与神韵两派借助《文心雕龙》所展开	

的文论斗争·····	(290)
(1)比较分析《文心雕龙》对于钱谦益与王士禛的 影响·····	(290)
(2)纪昀的《文心雕龙》批评及其文学思想之研究·····	(343)
(3)清代前中期围绕《文心雕龙》所展开的对文笔等 文体问题的讨论·····	(373)
(4)《文心雕龙》对晚清民初《选》学派与桐城派斗争 的影响·····	(390)
5 刘勰与佛教关系的考辨·····	(416)
6 对刘知幾《史通》与《文心雕龙》相关性之考辨 ——看《文心雕龙》在史学领域的影响·····	(444)
7 《文心雕龙》对于书画理论领域的渗透·····	(459)
参考文献·····	(462)
后记·····	(469)

1 刘勰略传 与《文心雕龙》之产生的文学史背景

第一 刘勰略传

刘勰的生平事迹,《梁书》和《南史》有记载,因为叙述十分简略,对其身世,后人也只能知道大概情况。刘勰一生经历几次重大事变,其具体情形以及作出抉择时的内在动因,后世研究者虽百思也不得确解,如同迷雾笼罩,有的解释也只能视作推测而已,这更使刘勰其人其书增添了神秘色彩。

由于“文献不足徵”,本书拟就《梁书》与《南史》所提供的材料(《梁书》文字稍详),对刘勰身世略作介绍。刘勰,字彦和,虽是东莞莒人,却是出生于南方的“莒人”。莒(大约在今山东莒县),春秋时期称莒子国,前汉属城阳郡,后汉属琅邪郡,晋太康元年(280),置东莞郡,十年(289),将“莒”划归东莞。永嘉时,北方沦陷,无数北人流离失所,渡江来到了南方,其间大批东莞莒人也加入了这一迁徙的洪流。东晋统治者将北方地名强加于南土,虽显示出北人对故土的留恋,却也反映了他们反客为主的优越感。晋明帝始侨立南东莞郡于南徐州,镇京口(大约在今镇江市),南朝各个时期也沿用了这样的行政区划。据《梁书》记载,刘勰的祖父刘灵真,是宋

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刘秀之是刘穆之堂兄的儿子,^①依照《宋书》本传,他们均“世居京口”,故而,刘勰一族居住在京口,到刘勰出生时已历经数代,北方的“莒”,是刘氏难忘的桑梓之地,然而却不过是其遥远的记忆了。无怪乎日僧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的天卷《四声论》(经学者考证,即刘善经之《四声指归》),其中提到:“又吴人刘勰著《雕龙篇》云……”直接将刘勰冠之以吴人籍贯。

本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刘勰的父亲名尚,曾任宋越骑校尉,他死得早,所以刘勰较早就失去了父亲的照拂,此“早孤”之谓也。刘勰笃志好学,由于家境不好,他放弃了娶妻的念头。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断言刘勰“不婚娶”并非因为“家贫”的缘故,而是为了佛教信仰,并以当时士人风气为佐证。^②然而非常私人化的事情,可能有当事人特殊的因缘,后人不必强为之注解。有一人在刘勰一生中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此人即齐梁时代著名的高僧僧祐,刘勰追随僧祐,前后共有十多年。本传的叙述讲到其“笃志好学”在“依沙门僧祐”之前,而所谓“博通经论”是指佛教的经律论,这说明刘勰的学养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在跟随僧祐之前,主要投身于儒家经典的学习;拜于僧祐门下,才转而系统地研习佛经。知道刘勰生卒年,并推知刘勰跟从僧祐时的年龄,对于认识刘勰思想结构,意义重大。关于刘勰出生时间,范

^① 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问世以来,就对刘灵真是否刘秀的亲兄弟存疑,后又有学者比较《南史》与《梁书》的差异,指出《南史》中删除了“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句话,因此认为《梁书》记载不足信。这种存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不必完全相信《南史》。比如沈约《宋书·自序》,沈氏也信奉天师道,但讲到“戎子……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兄弟间名字也并不一致。或许此时人多妻,有嫡庶之分。

^②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之《序志》篇注文,有非常细密的考证。他据《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推断出“彦和自宋泰始初生”,得出刘勰约生于公元465年,卒于公元520、521年间的结论,此大致上是可信的。释慧皎编撰的《高僧传》有三处记载刘勰为名僧写碑志,据此或可推知刘勰之依僧祐的时间,《高僧传·释超辩传》说超辩“……止定林上寺……足不出门三十馀载。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门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永明十年是公元492年;《高僧传·释僧柔传》说:“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义士。以柔耆素有闻,故徵书岁及。文宣诸王再三招请,乃更出京师,止于定林寺。躬为元匠,四远钦服,人神赞美,文慧、文宣并伏膺入室。柔秉德居宗,当之弗论,常誓生安养国……至临亡之日……奄然而卒。是岁延兴元年……沙门释僧祐与柔少长山栖,同止岁久。亟挹道心,预闻法味,为立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延兴元年是公元494年;《高僧传·释僧祐传》说僧祐“以天监十七年五月二十六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天监十七年是公元518年。而刘勰本传说他跟随僧祐达“十馀年”,刘勰离开僧祐应在“天监初,起家奉朝请”时,“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高僧传》说临川王宏(萧衍同父异母弟)尊僧祐为师,僧祐的推荐可能起了关键的作用,《梁书·太祖五王传》说临川王宏“天监元年,封临川郡王,邑二千户。寻为使持、散骑常侍、都督扬南徐州诸军事、后将军、扬州刺史,又给鼓吹一部。三年,加侍中,进号中军将军”。所以上述“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最早也应在天监三年,即公元503年,从此时后推十馀年,便大约是刘勰依僧祐的起始时间,上述名僧碑文最早一篇制于永明十年,距离刘勰离开僧祐计有十一年,《高僧传》本传记载僧祐门徒众多,超辩是定林寺资深的高僧,操办他的丧事,一定是

佛门非常隆重的事情,《高僧传·释法献传》说法献与玄畅分别在建武末年与建武初卒后,“献弟子僧祐为造碑墓侧,丹阳尹吴兴沈约制文”,沈约在当时已是文坛大老,由此联想到,被请撰制名僧碑文,是对执笔者文采的肯定,更是执笔者的荣耀,很难置信僧祐会起用一个刚入山门的刘勰承担此任,并且两年后,令他再为定林寺元老级高僧僧柔制碑文,这样做一则会不服众,另则刘勰对佛学还尚未深窥堂奥,对寺内大德高僧也缺乏深切了解,因此可以推想,永明十年不会是刘勰投于僧祐门下的最初时间,刘勰依僧祐之“十馀年”,其初始时间应在永明十年前数年,此“十馀年”不妨把它设想得长一些,而且即使刘勰走上仕途后,还是与僧祐保持着亲密关系,因此“十馀年”是一约数概念,如现存刘勰《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根据《高僧传·释僧护传》载“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当时刘勰已离别定林寺,可见刘勰为制碑铭也是因为僧祐的缘故。

范文澜推断刘勰拜师僧祐时间,说:“父尚早没,奉母家居读书,母没当在二十岁左右,丁婚娶之年。其不娶者固由家贫,亦以居丧故也。三年丧毕,正齐武帝永明五六年。《高僧传·释僧祐传》云‘永明中,勅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伸受戒之法……’彦和终丧,值僧祐宏法之时,依之而居,必在此数年中。”范文澜假设当时是永明五、六年,彦和年二十三、四岁。如果此一推测无误的话,刘勰依僧祐的“十馀年”就积有十五、六年之久,也就是说刘勰在僧祐身边仅四、五年便出类拔萃,被僧祐视作最具文才者,成为僧祐最赏识的门下,这对于一个天赋很高的年轻人而言,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范文澜上述诸如刘勰居母丧在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认为刘勰开始从僧祐游是在僧祐永明年间声名鼎盛之时,也毕竟是推测之词,建康与京口相距并不十分遥远,因此,再早一、二年刘勰已经结识僧祐,也并非不可能。

无论如何,刘勰依僧祐时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了。从《文心雕龙·序志》篇自述“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来看,刘氏虽侨居南土,家庭教育却还是遵照古训,刘勰发蒙不会晚于七岁,这是南迁莒人敦尚儒业的浓郁风气使然。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指出当时山东等地的移民“至侨民麇集之地,则江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一带为最”(《长水集》上册)。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指出“且名儒之隐居京口讲学者,先后有关康之(见《宋书》及《南史》本传)、臧荣绪(见《南齐书》及《南史》本传)、诸葛璠(见《梁书》及《南史》本传)诸家,流风馥韵,或有所受之矣。”^①他们聚居京口,意味着儒学重心的南移,形成了一个并不逊色于北方的儒学环境,北儒传统并没有在京口等地出现断层,到刘勰时代,依然薪火相传,他从小笃志好学,深受此种环境熏染,刘勰的学术能与北方儒学发展相衔接,据此可知刘勰一生的学术二十多岁时确乎是以儒家为主(当然莒儒也多儒释兼修者),而后再转入佛学的研习,他前期在儒家经籍方面已经打下扎实的根基,并且擅长辞章,这是他蒙僧祐赏识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僧祐将刘勰用作私人文胆,因为即使写作佛教方面的文字,也必须首先具备中土语文的修养,而且作文还须天赋,刘勰是兼具修养与天赋的。而僧祐作为齐梁时期的佛教领袖、律学大师,其佛学精湛自不待言,然而在制作一些碑铭等场面文字上,似乎稍逊文采,《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二僧祐撰《法集杂记铭目录序第十》说:“祐少长山居,游息净众……所撰法集,已为七部,至于杂记碎文,条例无附,辄别为一帙,以存时事。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有关佛教诸如目录学等方面的文字,基本属于佛学专业范畴,僧祐亲自捉刀,而碑铭、行记不可质木无文,必须文采斐然,他则坦然承认

①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由自己授意,再请别人代笔,可见请人代笔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太忙的缘故。根据紧接上文载录的碑铭三篇署名刘勰、一篇则署名沈约,可见“文自彼制”,刘勰的文字才华深得僧祐的信赖。

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深受儒学熏陶的刘勰与僧祐或与佛教的关系究竟如何?读《序志》篇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程器》篇有“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云云,在《文心雕龙》全书里多处可以体察到刘勰这种生命的焦灼感与使命感,还是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追求不朽为人生观;清纪昀评《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① 少年时代莒儒的影响毕竟是浹肌沦髓的,纪氏看出刘勰积极入世的性格与人生追求。上述三则高僧传有一特点,那就是僧祐前冠以“沙门”二字,刘勰则称其“东莞”籍贯,而僧祐之死,则由弟子正度立碑颂德,刘勰并不在弟子之列,还是以籍贯指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已注意此一现象,并指出慧皎《高僧传》终于梁天监十八年。碛沙藏本《弘明集》收录《灭惑论》,也署名“东莞刘记室勰”,还应引起注意的有唐代释道宣(596-667)所撰《续高僧传》卷五谈到梁武帝时“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大正藏》第2060卷)显然将刘勰归入俗家弟子之列。这说明刘勰在佛门内外、直至僧祐去世,其身份一直处于黑白之间。换言之,刘勰依僧祐,自始至终未曾割断俗世情怀,与清静佛门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作为游刃有馀地周旋于朝野上下、缙素两界的僧祐,他完全清楚刘勰的志向和怀抱,所谓人各有志,僧祐高明之处在于既能发挥刘勰善于辞章之所长,又尊重其人生理想。

^① 纪昀《纪晓岚评〈文心雕龙〉》,根据道光十三年两广节署刊本影印,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

等到天监初年,刘勰“起家奉朝请”,此必在“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前一、二年,即天监三年前两年之间,杨明照认为是沈约在其间出力的缘故,他这样解释,可能是出于僧祐方面的考虑,觉得僧祐不会放走自己得力的助手,尤其作为僧人,更不会鼓励门下走仕途。但是,从《高僧传·僧祐传》可以看到,刘勰并不在僧祐佛门弟子之列,他在僧祐门下,犹如佛门的“客卿”,虽然才学方面是僧祐徒众之冠冕,但是他不会终老于定林寺,对此刘勰与僧祐当有默契,所以一旦机会出现,刘勰告别定林寺,去做临川王宏记室,而萧宏也正是对僧祐执弟子礼的王族人物,僧祐居中推毂,刘勰依靠僧祐举荐,步入政坛,其可能性远较仰仗沈约提携要大。张少康先生分析刘勰入定林寺的原因,是走终南捷径,指出刘勰就是希望依赖僧祐,以结识权贵,从而达到其经世致用的目的,^①此种看法是正确的。明白此点,对于刘勰不娶的心理也比较容易理解,刘勰二十岁左右,时值南齐永明年间,南齐有所谓“黄籍”制度,用人看出身,门阀观念馥势尚存,对于士人仕宦起到关键作用。像刘勰一则“早孤”、“家贫”,另则对于刘勰一族门第高下,虽有不同意见,然而刘氏门第并不显赫,当时刘勰家庭十分落魄,却是不争的事实。像在这样的境遇里,很难攀一门高亲,此也是势所必然的。在高不成的情况下,屈就于门第低于自家者,对于胸有大志的刘勰而言,非但会感到有玷门楣,而且这样的婚姻会对日后仕途带来负面影响,他不愿降格以求,因此他才断然作出“不娶”的人生抉择。对此,张少康先生曾有赐教。

作出这样的人生抉择,刘勰必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也必然隐含着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遁身空门,除了上

^① 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之一《刘勰的生平和思想》,济南:齐鲁书社,1987。

述功名的考虑外,另则表面上能够为自己的“不娶”找到回答世俗的借口,而从深层次看,只有佛门才是刘勰一流人物的精神家园。南渡以来,玄学依附于北方高门甲族,贵游子弟也以谈玄为时尚,是其政治特权、文化霸权的象征。而打击玄学,其真实用心就在于抑制既得利益者,而借助佛教正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有助于摧毁北方高门的自命不凡,这促进了佛教与中土思想学术争地位,对于佛学摆脱玄学的解释权,在三教中后来居上,应该视为重要的动因。当然,高门士族也有讲论佛教者,但是其学风大致停留在将佛教玄学化的阶段,固守玄释交融,不愿彻底走出玄学的笼罩。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谈到“世族与佛教”,当时世族信佛者人数不少,但是汤氏以“谢灵运”为典型例子,指出:“其于佛教亦只得其皮毛,以之为谈名理之资料,虽言得道应需慧业,而未能有深厚之修养,其结果身败而学未成。”谢氏不愿放下高门的架子,以“东山”与朝廷对峙,而又不能真正隐逸,所执著的正是其优越感,这是影响其佛学进境的重要原因,汤氏所言甚是。汤氏接着总结道:“由此言之,当时名士之所以乐与僧人交游,社会之所以弘奖佛法,盖均在玄理清言,(延年所称许之慧亮,著有《玄通论》。)与支、许、安、汰之世无以异也。”^①世族佛教一直到齐代也未能超越《世说新语》所记录的佛教境界。僧祐俗姓俞,门第不高,他所编的《弘明集》传达了寒门的声音,《四库提要》评述曰:“其大旨则主于抑周孔、排黄老,而独伸释氏之法。”所谓“抑周孔、排黄老”,似乎其针对的论敌是道教,而从根本上讲是动摇固有的文化学术秩序,以此来推动社会的改革,南、北寒士容易在这点上结成同盟,共同发愤于佛教。梁武帝《述三教诗》回顾其学术经历,少年学习儒家经典,中年信奉道家,然“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星”，犹如“觉今是而昨非”，衷心感叹“示教惟平等，至理归无生”，而且“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①明确置释迦牟尼于三教至尊的地位，以佛教为“平等”作舆论，寄寓了其重新调整社会关系的深意，作为门第卑卑不足道的萧氏，从萧齐到萧梁，在社会政治里，如“黄籍”制度等门阀馀势，毕竟是掣肘王权的因素，旧有高门的自负也令新王朝不快，加之冒袭充斥，门籍讹滥，因此，虽然梁初武帝也不得不借重孤傲的谢朓、王亮等名门的声望，但只是装点门面而已。随即用佛教来扫除一切王权之外的势力，与天下更始，梁武帝之崇佛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如沈约出自南方寒门，他撰《晋书选举志九品论》，感叹人物品第“盖以人才优劣，非谓代族高卑”，与其《佛知不异众生知义》等结合起来看，^②显然此辈人物的意见，完全是出于一己身世的感发。而刘勰对此社会思潮，也自然会拥护赞成。从《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出，刘勰对于玄风及其文学现象，并无好感。如《论说》篇列叙魏晋玄学代表人物与作品，除了对王弼等风毛麟角表示尊敬以外，总结道：“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佛教所具有的无限超越性品格，这对心高气盛而受出身局限的刘勰来说，提供了精神慰藉，凭借佛教也令自己找到睥睨权贵的尊严，他显然认为佛教高于玄学，此与《弘明集》主旨完全是一致的；《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并且具体涉及到宋代作家“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飏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此辈像王袁颜谢大都有门第背景，其实是当时士族的代表，然而对玄言诗以及山水诗，他一概没有正面的评价，《明诗》篇说：“江左篇制，溺乎

①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第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② 《广弘明集》卷第十二。

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其“情”与“辞”用力的方向都与刘勰相背，因此隐含着刘勰深深的不满。所以刘勰与僧祐及定林寺结缘似乎是命定的，而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不能不察。

关于《文心雕龙》的写作，其起讫时间，文献也无明确记载。只是其完成于何年，古来学者就思考过这一问题。晚唐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提奖之重蔑有称实再抒鄙怀用伸酬谢》曰：“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①明确将《文心雕龙》所论断代至宋齐，似乎已看到《时序》篇“皇齐”意味着写作《文心雕龙》的时间；清代校勘大家顾千里也看到了这点。纪昀熟悉史事，他也比较关注《文心雕龙》成书时间问题，《原道》篇之《纪评》：“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时序》篇之《纪评》：“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虽尚未作细密之考证，但是《文心雕龙》作于齐代，由纪昀较早明确提出；郝懿行（1757—1825）曾校批《文心雕龙》，现存传录郝懿行《文心雕龙》校本，^②在《才略》篇“九代之文”句上，郝氏眉批曰：“按《时序》篇赞称‘蔚映十代’，并数萧齐而言也。兹篇及于刘宋而止，故云九代而已。”也看出《文心雕龙》断限于齐代，此对于了解《文心雕龙》成书时间也是有帮助的；后之仪徵刘毓崧《通义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说：“《文心雕龙》一书，自来皆题梁刘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则多弗深考。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观于《时序》篇云

① 《全唐诗》卷六百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藏吉林大学图书馆。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录，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遐疑当作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所谓‘今圣历方兴’者，虽未尝明有所指，然以史传核之，当是指和帝而非指东昏也……”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于齐和帝时，齐和帝在位只有两年，时值公元 501、502 年，刘勰立论严密，堪谓在纪氏等人基础上后出转精。而近人李详则认为：“《文心雕龙》作于齐代，告成于梁朝。”^①此说只是调停成书于齐代与梁朝二说，但是不能驳倒刘勰的考证，就很难另立《文心雕龙》成书于梁代之论。

《文心雕龙·序志》篇说：“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有所感悟，“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从刘勰出生于泰始初公元 465 年来推算，到齐和帝时，他大概是三十七、八岁，假使其“齿在逾立”是指三十一、二岁，那么他就用大约六、七年时间，完成了《文心雕龙》的写作。

《梁书·刘勰传》说《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为官经历宋、齐、梁三朝，所谓“贵盛”，似乎在齐明帝

^① 李详《愧生丛录》卷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